

加工“泔水油”、“地沟油”8年,经销鲁冀晋鄂等省,涉案金额 5000 余万元

山东“地沟油”案一审“开出”最高刑

朱氏哥仨制、售、销“三毒俱全”，一人领死缓两人无期

本报记者 丛民

1月7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两起制售地沟油案件进行宣判。其中，被告人朱传峰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朱传清、朱传波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于海波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记者了解到，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制售数量和涉案金额最大的“地沟油案”。

兄弟三人合伙制售“地沟油”

审判机关查明,2001年3月,朱传峰、朱传清、朱传波兄弟三人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平阴县孔村镇郭柳村油厂(个体经营)从事动物油加工、销售,2005年转向“泔水油”的回收再加工业务。2007年3月,三人在油厂原址注册成立平阴县孔村镇城南兴财油厂(个体经营),并组建南车间,从事生物柴油、动物油的收购、加工、销售。2009年3月,三人出资以朱传清的连襟杜恒强为法定代表人,注册成立发达公司,在原厂基础上组建东车间,从事生物柴油、油酸、硬脂酸及植物沥青等工业用油的生产、销售。

自2006年起,他们先后从山东、北京、江苏、新疆等地大量收购“泔水油”,白土等原料生产“地沟油”,在明知他人将向其所购的“地沟油”冒充食用油进行销售的情况下,仍将“地沟油”销售给山东省聊城市昌泉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济南千门商贸中心、济南大中粮油有限公司、山西省侯马添仓粮油有限公司、河北省保定市三丰路亚辉粮油经销部、湖北省监利县永兴英华食用油门市部等17家食用油经营户,销售金额共计5241万元。

在朱传峰、朱传清、朱传波三人的招募下,杜恒强于2003年到该公司从事动物油收购,2007年至案发期间负责公司生产管理,蒋卫东于2006年到该公司任西车间主任,主要负责设备的维修和西车间的生产,杜恒

才、朱传国、刘兴善先后于2003年、2006年、2009年到该公司任业务员,负责“泔水油”的采购和“地沟油”的推销,被告人朱洪涛于2008年3月到该公司负责卸装“泔水油”和灌装“地沟油”,刘恒亮于2010年10月到该公司,负责在西车间过磅和收取油款。上述多人在明知朱传峰、朱传清、朱传波的公司用“泔水油”生产“地沟油”,并将“地沟油”冒充食用油销售的情况下,仍参与生产、销售活动。

案发后,蒋卫东、朱传国、刘恒亮到公安机关投案。

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

发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购进的“泔水油”没有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出售生产的油酸、硬脂酸产品时须向对方出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能抵扣税款,朱传清向马玉旺(食用油个体经营户,另案处理)提出帮忙开具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马玉旺同意,并在发达公司与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益海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青岛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没有实际购销业务的情况下,以发达公司名义与对方签订虚假合同,让对方给发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帮助发达公司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3张,金额超过1300万元,税额超过170万元,价税总计逾150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朱传峰、朱传清、朱传波等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数额特别巨大;发达公司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朱传清、朱传波作为发达公司的业务及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让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朱传峰、杜恒强、杜恒才、朱洪涛、蒋卫东、朱传国、刘兴善、刘恒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朱传清、朱传波的行为分别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二

人数数罪并罚。依照《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朱传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朱传清、朱传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被依法分别判处五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多家药企“中招”地沟油原料

1月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被告人于海波、邢洪生、被告单位大中粮油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刘太金、于召荣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案。

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9月,被告人于海波、邢洪生共同注册成立千门商贸(非法人独资企业),从事粮油销售等业务。于海波、邢洪生为获取高额利润,自发达公司、博汇公司、格林公司低价购进以“泔水油”为原料生产的“地沟油”,尔后按比例掺入四级豆油中,销售给齐发药业、倚天药业等多家制药企业,期间,为避免引起他人对千门商贸独家长期向上述制药企业供货的注意,于海波、邢洪生于2009年10月以于海波的妻子张红为法定代表人,注册成立大中粮油,采取上述同样手段与千门商贸交替向上述制药企业销售勾兑后的豆油。自2007年9月至2011年7月,两公司共计销售32628吨,销售金额2.8亿元,其中,于海波负责千门商

链接：

地沟油是废弃食用油脂的俗称,是指宾馆、饭店附近的地沟里,在污水上方的灰白色油腻漂浮物,捞取收集后,经过简单加工得到的呈黑褐色、不透明、有强烈的酸腐恶臭味、凝固点高的油。

我国近期频繁发生地沟油生产销售的犯罪案件。据统计,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达百万吨。“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升级到大工厂,



业分工也越来越细化为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地沟油”生意不但打而不死,甚至还越做越大。

2011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3个月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会战,共侦破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犯罪案件135起,抓获涉案人员近800人,打掉制售“地沟油”作坊、工厂、市场、窝点100余个。

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海波、邢洪生、刘太金、于召荣在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分别判决被告人于海波、邢洪生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太金、于召荣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七年,并处罚金。



旅游订单遭取消 游客要退一赔一

法院认定携程网不构成欺诈但需退还团费

一位消费者用携程网订购台湾跟团游,付费第二天被告知行程因故取消,该消费者认为受到欺诈,将携程网告上法院。近日,经上海一二审法院审理,该案审理终结,携程网被判全额退还团费,但不承担“退一赔一”责任。

2013年4月22日,李先生登陆“携程旅行网”,订购了“台湾8日豪华团队游”,出发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4月24日,李先生支付了团费3.7万余元(包括4名成人和1名儿童),不料付款第二天就接到携程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因参团人数不足15人,未达预期,故订单需取消。李先生当即表示异议,称网上显示目前参团人数已有16人。几小时后,携程网再次致电李先生,改称因产品调整,李先生订购的旅游产品已被取消。李先生认为携程网的做法属于欺诈,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携程网全额退还团费,并承担“退一赔一”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团费全额退还,但驳回了赔偿3.7万余元的诉讼请求。李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审理认为,台湾跟团游“网上预订”页面载有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合同及补充条款,其中约定“最低成团人数15人;在出发日前30日以上,且携程网未宣布成团前,双方提出解除合同的,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携程网提出解除合同的,全额退还旅游费用(不得扣除签证费用);旅游者提出解除合同的,如已办签证,应当扣除签证费用”。该条款虽为格式条款,但公平分配了双方解除合同的义务,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方面存在前后答复不一致的服务瑕疵。(文中人物为化名)

(朱瑞)

读旅游合同及补充条款,并接受所有内容”。显然,对于解除合同的条件和后果,携程网已有明确的提示和告知,故李先生对包含合同解除条款的订单进行点击确认,应视为同意接受该条款的约束。携程网在尚未宣布成团前的合理期限内提出解除合同,并未违反合同约定。“退一赔一”的前提是商家存在欺诈,但携程网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故携程网应全额退还团费,但不需承担“赔一”责任。二审据此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审结后,主审法官解释,该案所涉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对书面合同的理解;二是对“欺诈”的认定。所谓以书面形式签署合同,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先生表示其未与携程网签署过书面合同,故携程网无权援引合同解除条款,要求解除合同,该观点是误将对“书面”的理解局限为“纸面”。实际上,李先生以专有账户登录携程网,双方之间通过网络电子数据交换的方式,已经确定了合同内容,并以有形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双方间的网络旅游合同符合“书面合同”要求。而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包括法院在內的执法部门,明确表态不支持民间打假,甚至把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的反常规维权之法等同于敲诈。其理由为: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是“为了牟利”,“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消费者”等。譬如深圳、上海等地的法院就不受理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事实上,

持假文凭谋职被辞后要补偿

仲裁委：企业辞退合法

本报通讯员 田伯韬 赵斌

陆某是湖北襄阳市区某建筑安装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2012年4月,该建筑安装公司与其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当年7月,其参加了该公司组织的培训后,被分配至公司设在甘肃兰州的一项目部工作。2013年5月,该建筑安装公司以招工的部分人员学历系伪造为由单方解除了与陆某等10余人的劳动关系,于是,陆某向襄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这家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失业金。

法庭调查得知,2012年7月,襄阳市区某建筑安装公司招收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经过培训后,包括陆某在内的这批大学生被输送到各工地。然而不久后,该公司发现这批学生业务能力差距很大,一些大学生不能胜任工作,甚至对建筑专业知识一点都不懂。进一步调查发现,新招人员大部分所持文凭是伪造的。为保证施工质量,该公司决定辞退陆某等12名持假文凭的人员。

仲裁委员会调查也显示,枣阳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杨某,在收取了陆某等6万元

“上岗金”后,为陆某等伪造了学历证明,并介绍到这家建筑安装公司工作。整个过程陆某都积极参与配合。

仲裁委认定陆某从未在某工业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其委托他人伪造学历证明并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在该公司违背真实意愿情况下进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解除行为合法有效。仲裁委裁决该建筑安装公司不用向陆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双倍经济补偿金、失业金,但要向陆某支付上班期间的劳动报酬。

针对此案,仲裁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项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第28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由此可见,这家建筑安装公司解除与陆某的劳动合同合法;同时该公司已向陆某按月支付了劳动报酬,陆某要求该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金损失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最高法新规有利食品药品“职业打假”索赔

吴学安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行为发生时,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到底属不属于敲诈消费行为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是对此规定的评价,存在较大争议。

如果说,30年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时,没想过职业打假人会出现,而现在就陷入了一个法律悖论——如果不知假买假,往往没办法证明商家卖出的是假货;而如果说知假买假,则不符合消法规定,就不被认定为消费者。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石景山法院此前发布的《石景山法院消费者诉讼纠纷的难点及解决办法》首次明确,职业打假人视同于普通消费者,具有消费维权类案件的原告主体身份。据悉,这是北京法院系统首次正式确定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根

据多年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石景山法院认为,消费者在消费维权类案件中,多处于弱势地位,而职业打假人无论从举证能力,诉讼经验都高于一般消费者,确定职业打假人在消费维权类案件中的主体资格,更有利于净化消费市场。

此前,石景山区法院之所以勇于“吃螃蟹”,为职业打假人正名,是因为这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在消费维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难以区别普通消费者与职业打假人。鉴于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职业打假人就没有诉权,由于目前职业打假人的消费主体身份一直遭到质疑,出现很多职业打假人常常躲到幕后,而把一般消费者推到台前的消费维权案件,或者一般消费者当原告,职业打假人充当代理人的案件。以职业打假人身份来阻止职业打假,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阻止职业打假人通过诉讼维权或者作为一种索赔手段。然而,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北京石景山区法院认可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的做法,还是上海、深圳等地法院不认可职业打假人

的消费者身份的做法,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要真正认定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其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其是否具有购买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示,“法院对于‘知假买假’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无论法学界还是审判实践中都存在不同认识。有的法院支持,有的法院不予支持。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支持了‘知假买假’的索赔,对于统一司法尺度、打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此次司法机关结合“知假买假”法律特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原意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无疑具有法律上的实际指导意义。但是对于所谓职业打假人,甚至形成的一些公司“知假买假”,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因为职业打假本身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对假冒伪劣行为起到制约、遏制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一些道德风险或者市场秩序上的问题。